

（二〇一六年二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劫后反思】	献给这个伟大日子——答马晓力	罗点点
【往事非烟】	和高岗女儿同桌	陶洛诵
【不堪回首】	我的“煤黑子”生活	李建宇
【研究报告】	文革后中国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遗产”	杨继绳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劫后反思】

献给这个伟大日子——答马晓力

• 罗点点 •

（编者按：上接罗点点、马晓力：“关于反思文革的讨论”，见本刊 zk1601c）

晓力，谢谢你的点评。

可是我并不认为，任何人因为曾是“文革受害者”，或者没在文革中学会“骂人”，就有权利不反思文革。群里不是有人说“文革始于文革前”吗？这个判断很深刻，我颇以为然。

2014年德国人拍了一部电影叫《缄默的迷宫》，说的是法兰克福审判。

较著名的对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共有三次，时间依次为纽伦堡审判、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和法兰克福审判。在前两次审判中，中下级军官逃脱罪责的常见借口是他们只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甚至还有人据此声称他们是国家的功臣。而法兰克福审判的意义恰恰是针对这些借口，成功追究了纳粹罪行中的个人责任。正是这场在德国本土进行的第二次审判，通过艰难的法庭辩论和大量的确凿证据，找出个人在国家罪责中必需承担法律责任的结论，并定下铁案。据史料记载，为了这次审判，检察人员和法官参阅了4000多种文献资料，动员了19个国家的359个证人到庭提供证词，其中包括211个大屠杀的幸存者。主审大法官鲍尔还通过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专家们的帮助，有力地证实了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确实是一场法西斯政权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最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服过役的6000名纳粹军人中，虽然只有6名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这是西德废除死刑后的最高刑罚），另有11人因参与谋杀罪被判十四年监禁，但是法兰克福审判贯彻始终的德国式法律精神和对重大事实的证据充分仍然令人折服。无论打击什么类型的邪恶犯罪，法律是唯一可选择的手段。严格的法律程序无疑使法兰克福审判至今闪耀着理性和人道的光辉，尽管有人说它“不近人情地匡扶了正义”。

但我想跟你说的并不是《缄默的迷宫》讲述的这段史实。而是它通过一位年轻的法兰克福检察官的故事带入的另一残酷话题。

1958年战败后的西德，举国上下对战争罪行保持缄默。曾经的纳粹党员遍布朝野。国家整个司法系统内，几乎人人都当过纳粹。当然，无论是否曾与国家合作，也无论是否当过纳粹，人们都在尽量回归日常生活。这时的德意志民族需要生存和信心，国家的发展需要团结和力量。任何忏悔甚至是自我惩罚的意识都相当不合时宜。可是，人心就是如此奇特，人性就是如此复杂。骇人历史造成的苦痛无法在生活重建中消弭，对暴行为何发生的追问也无法在故作遗忘中停止。这是不是有点像咱们现在？总之检察官的处境很艰难。他要承受巨大社会压力，要从如山的卷宗中找到支持公诉的证据，还要从错综复杂的证人证言中发现和归纳出有用的线索。把那些生活在身边的，与常人无异的杂货店老板、面包师、伐木工、牙医、汽车维修工……一个个以谋杀罪名逮捕归案也是件非常痛苦和不近人情的事。可是这些都不算什么，检察官也从未因这些艰难而退缩。一直到……一直到他在调查中发现自己在战争中失踪的父亲不仅仅是一名职业军人，同时也是纳粹党员的时候！他的恐慌达到极限！他动摇了……要知道，父亲是每一个孩子的偶像。尤其当父亲是为国家利益牺牲的战争英雄的时候。多年来，失踪父亲“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的遗言，是年轻检察官放在案头的座右铭……。对罪恶的追问和深究竟然带来如此结果，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很快他又发现女友的父亲也是纳粹。在女友眼里，繁重的审判工作和对法律公正的执着已经使他变成了违反人伦的冷血怪物，女友逃离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毅然辞职，带着破碎的精神世界，检察官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生命血肉灰飞烟灭的现场，在110万亡灵出沒的绿茵之上，他展开一纸古老希伯来祈祷文喃喃念诵……。

人的基本良知在惨绝人寰的非人现场中所能达到的顿悟和警醒，顷刻间呼啸而至。渺小个体面对强大历史和国家谬误时可依靠的唯一人性力量，冥冥中飞舞上升。代表新一代德国人的年轻检察官，用这种锥心刺骨的痛苦追问，完成了自我救赎，并站在了时代的潮头。将这个“父亲是纳粹”的故事放到今日文革反思的话题中，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尽管我们这些人中谁也没有不反思文革的权利。可是反思、追问、深究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群里除了“文革始于文革前。”的判断，还有一些议论相当有益。

比如说反思文革要回答的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本来意义上的道统（可以肯定在一些人身上会还原成‘血统’）”；“马克思主义作为源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的试验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在社会和科技进步背景和社会未形成公民意识时，通过造神整合国家精神是有效还是无效”；……等等，等等。要回答这些最现实同时又是最经受不了诘问的问题，我们真准备好了吗？或者，我们最终真能准备好了吗？作为平庸软弱的大众一员的我一向悲观。退守任何时候都不突破做人底线的这条底线，是我在艰难时世中唯一可依赖精神支柱。电影中的年轻检察官最后有句奇怪的台词，他归结自己的勇敢和能坚持到最后的动力，仍然用了老纳粹父亲的那句话：“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你说，这是不是真相水落石出之后，正义在突破道统血统得到伸张之后，我们与父辈在人伦意义上可能达到的最后谅解与宽恕？晓力，本月27日是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日。与你商榷之时，请允许我将这些微小文字献给这个伟大日子。

点点2016年1月13日星期三

~~~~~

## 【往事非烟】

### 和高岗女儿同桌

• 陶洛诵 •

插队（包括拘留所833天半）夺走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当我病退回京（病退的经过另文详谈）时已二十九岁了。

一天，我独自踽踽街头，漫无目地的在灯市东口一带游荡，东边是史家胡同小学，本是民族英雄史可法的祠堂。我在这里度过了金色的童年时代。西边是女十二中，在那儿我度过了一生最快乐的少年时代。我回忆“努力，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段有意义的生活，微笑浮到我的脸上。

“陶洛诵”，有人轻声细语地叫，我四下张望，没有一个认识的人。“陶洛诵”！喊声出自迎面走来的一个青年女性。“高滨滨，是你！”真令人意外，滨滨变化不大，梳着两根不长不短的辫子，两根粗粗向上挑的眉毛，双眼皮大眼睛，瞳仁是深黄色，皮肤很白（现在想来她是不是有苏联血统啊？），下磕尖尖的，滨滨其实挺好看的，只是个子不算太高，可也过得去。

滨滨是我师大女附中同班同学，而且文革爆发前，我俩同桌。

“哎，你加入组织没有？”这竟是她见我的第一句话，我一下子泄了气，知道没什么好谈的了。“加入组织”是一句行话，即“你参加中国共产党没有”？我心里嘀咕：“滨滨是不是被整傻了？”

“没有。你呢？”

“我也还没加入组织，我一直积极争取，不过还没批准。”看她那样，把入共产党当成人生第一大事，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想赶紧离去，“滨滨，我还有事，我得走了。”

“你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她不甘心。

“是的。”我想起文革中她骑着辆小红自行车找过我几次。

“等有时间我去找你吧。”她说。

我真怕她去找我，我们家的独门独院已经被一个有七个孩子的老工人夫妇占去了大半，我家拥挤不堪，我妈妈好不容易给我腾出一间8.8平方米的小屋，她认为我该和赵京兴结婚。

我吱唔着，看着滨滨渐渐远去的背影，心想：“十年过去了，怎么她一点也没开窍？”滨滨是共产党东北王高岗的女儿，因为这文革一开始就被我们班班核心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初，我们高二（四）班转来两个同学，其中一个是高滨滨，分配她跟我一桌。我当时住校，每天早起先围着学校跑三圈，再去教室读会儿书，滨滨跟大家一样，叫我的外号“guuse”（俄语“安静”的意思），我任俄语课代表领大家早读，经常说：

“guuse, guuse, mobapuusu”（安静，安静，同学们），大家就叫我“guuse”。每个人都有外号，滨滨来后就被改为“兵兵”了。

滨滨喜欢穿白的确良长袖衬衫，胸前别着个共青团团徽，她没有狂气与傲气，说话低声低气，对人和蔼，未言先低头一笑。学习成绩一般。总之，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之处。

一九六六年六月，全国各地大抓阶级敌人，就象发了神经病一样。不知哪位阶级斗争弦绷得太高的人，在“中国青年”杂志封底的一张画里看出十几条反动标语，其中一条是“蒋介石万岁”。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了文革序幕，只是大家懵懵懂懂，闭着眼睛瞎抓，可怜的滨滨成了我们班第一个牺牲品。

我们高二（四）班是一个在全校响当当的班集体，全是由外校考进来的尖子，没有一个不要强的。我们班各类出身的比例与全校差不多。可是高干不多，中下级革军革干，高级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一个资本家代理，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女孩，是大家崇拜的对象。崇拜原因现在实在想不起来，可能因为她与众不同的艰苦朴素。记得她有一次表扬自己：“有一个衣服扣子掉到厕所里，我思想斗争半天，还是捡起来。”

文革前学校学生里有些人入了党，后来改名为宋要武的宋彬彬就是党员，她爸爸是宋任穷。校领导和老师对家庭有势力的孩子另眼相待。文革初期，我们学校由邓榕传达她爸爸邓小平的指示，我看见白老师（共青团负责人）与邓榕并肩而行，邓榕滔滔地说着什么，白老师谦恭的态度就好同对待首长一样。邓小平当时有一句话：“娃娃们自己闹革命还是不好，要有人指导。”这句话我是后来在大字报上看到的。

因为受到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份去集训，一部分去军训，我被分配去邢台军训。我们班有几个人已被排斥在外，高滨滨，汪静姍、李筠等。高滨滨已被班核心打成反革命，唯一的罪名因为她爸是高岗。

记得那天在教室里，老师早已不存在了，校长，老师该关的关，该看的看，领导班级的是几个班核心，“高滨滨”，不知是谁厉声喝道“你站出来”。在这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她的爸是谁，起码我不知道，尽管我和她同桌。

那天也不是按上课时的坐法，一排排的脸朝黑板，而是围坐成一圈。高滨滨并不惊慌，慢条斯理地站起来。

“谈谈你的问题！”一个戴黄边眼镜，胖胖的，脖子上有道疤痕的外号叫小其的说，她爸是某部部长。

“我有什么问题？”滨滨反问。

“你爸是高岗。”小其交了底。

“哗——”，同学们窃窃起来，共产党的头号大敌高岗的女儿竟然在我们班。

我承认，高岗的名字确实吓人，他有别于地、富、反、坏、右、黑帮，他可是东北王，反党中央反毛主席，要篡权的。

“谈谈你对你爸的认识”。有人怒吼了。

“你说不说！”一贯温良恭俭让的大家崇拜的工人女儿厉声喝道，这一声撕毁了她在我们心中的形象。

我是不是也应该说些什么？我站起身来，滨滨看我一眼，我坐下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你不是说她挺好的嘛。”外号叫熊猫的人对我说，我不记得，但我沮丧地说了一句：“我是说过。”

火力全部集中在高滨滨身上。滨滨说：“高岗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想篡党篡权，最后服安眠药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不行，你这是背社论。谈谈你的认识。”班核心不依不饶。

斗来问去，高滨滨反反复复就是这么几句话，后来滨滨说要去上厕所，小其不让她去，怕她逃跑，滨滨说：“不信你就跟着。”小其笑着转一个身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后来班核心出了一份公告，公布了高滨滨数条罪状（其中有一条是说高爱抹雪花膏），正式宣布高滨滨为反革命份子。

滨滨的母亲是我们学校对面高教部的一个处长，听说带着两个保镖坐着小汽车来找校领导，校领导早被看押起来了。

滨滨的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由我们班张森等同学贴大字报时，给摘了。

滨滨受了点刺激，小其后来也受了点刺激。

一九八三年，我们高二四班部分同学在马恬家聚会，我感到奇怪的是，到会的人只有我一个非红五类，剩下的全是老红卫兵。大家都成了家，有了孩子，对以往的事大家都闭口不提，有人已经离婚，有人正准备离婚，大家也不谈丈夫，只谈孩子的教育，似乎都在回避“文革”这段创伤。

第二次聚会，还在马恬家，马恬搬到新房子。那天我带着孩子住在马恬家，我儿子和马恬的儿子都在中联部幼儿园，他俩同班。

马恬给我们拿来的被褥又新又暖和。

马恬的妹妹后来想出国，马恬托我办手续，我们班纪华也想出国。我对她们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在中国地位那么好何必出来受这个罪？”

听说宋彬彬去了美国，我们学校是红八月打人风的始作俑者。我们观看校领导一字跪在高台上，卞仲耘、胡志涛、李树民、汪玉冰等，有几个女孩子提着棍子不时打他们，宋彬彬正好站在我旁边，她半天憋出一句话来，像是自言自语“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后来宋彬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要武嘛”，伟大领袖下了最高指示，宋改名为宋要武，听说后来又改了回来。

□ 摘自《汉尊文化》

~~~~~

【不堪回首】

我的“煤黑子”生活

• 李建宇 •

1970年3月20日，火车把我送到铁路的尽头阳泉曲车站（不是阳泉，多了个“曲”，远了至少三百公里，是个村名），顺着逶迤的黄土山路，来到汾西矿务局柳湾煤矿，开始了我八年多的煤矿生涯。

我是前一天按照8341军宣队发的派遣证到地处山西省介休县的汾西矿务局报到的，不约而同到达的还有两个北大的和一个清华的学生。奇怪的是，矿务局干部处压根儿就不知道给他们分配了毕业生（鬼知道8341的分配机制是什么）。人都来了，怎么办？反正那时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部处负责人很利索地就把我们打发到不同的下属煤矿。

我被分配到柳湾煤矿，这个矿离矿务局四十公里，在孝义县境内。报到后一个星期都没人理我，在疑惑中我忽然明白了，这是在等我的档案材料，安排工作是要“看人下菜”，讲究“唯成分论”的。我出身不好，而且是非常不好，当年北大批判“修正主义招生路线”时，作为典型上过《北京大学大字报选》，在北大那个所谓“王八多”的地方都够个典型，眼下到了这偏远的矿山，更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果然，两天后干部科负责人匆匆把我叫去，让我马上到回采二队报到，当时他说话很强势，我顶撞了他，从此我的厄运也就开始了。

◇ 当上了“煤黑子”

第一天上班，到了接班室，学语录、读报纸，折腾上半个多小时，最后说几句生产的事，就下井。我跟着工人们走进坑口，大巷高大宽敞，时不时有电机车从身边掠过，还有点生机。进入副巷，就很狭窄了，有的地方还比较泥泞，挺难走。

我的工作就是装煤，叫“攉煤工”，是煤矿最低级的工种。“攉煤工”虽说是国家正式职工，待遇高（起步就给三级工，还有下井津贴，粮食定量每月五十八斤，细粮比例百分之七十），招工也很困难，对象主要是山西贫困山区的农民和河南“盲流”。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每人一个班要装二十至三十吨煤），攉煤工一般都干不了几年，往往因为工伤或疾病吃了“劳保”或调了工种，即使没有病伤，也要想方设法换个工作，有些人实在扛不住了，宁可辞职回家。

我的“煤黑子”生活就这么开始了，日子在一天一天地熬，睡觉时，腰疼得要命，连身都不敢翻。因为活太累，手吃力大，半夜醒来，五个手指攥不上，攥上又张不开，没过多久骨节变形了，又粗又大。

许多人一提起煤矿谈虎色变，常有人问我，你下井害怕吗？我说还用问吗？可害怕有什么用？让你下，你敢不下吗？正是因为怕出意外，我上班十天就请假回了趟北京，心想也许这是能和母亲见的最后一面，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如果出了事故，无依无靠的老母亲将如何活下去……到家后，我没有把实情告诉母亲，只说在井上机电队劳动，好在老太太还挺相信“政府”，怎么也想不到能把她的大学生独生儿子打发到井下去挖煤。

其实，说良心话，在井下干的时间长了，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可怕，煤炭生产早就是一项成熟技术，只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一般都不会出事故，但凡出事故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可是在“文革”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使人们丧失了理智，下井还真是可怕。那时，为了庆祝毛泽东的某个最新指示发表，或者是要迎接什么会的召开，矿上隔三差五就要组织“高产”，甚至“特大高产”。“高产”有两种形式，一是让井上辅助人员和机关干部下井支援攉煤，打人海战术；二是给第一线工人增加工作量或延长工作时间（有时长

达十二小时），属于疲劳战术，残酷，也危险，有时我们困得站着都能做梦，“煤溜子”一停，谁还考虑什么安全，赶快钻进“落山”，靠在石头堆上眯一小觉，说实在的，那时就盼着“煤溜子”出点毛病，好能歇会儿。井下工作本来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此疲劳的状态，哪有安全可言！

“高产”突破了设备和人员的实际负荷，煤矿是连续化生产，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全局，因此往往事与愿违，“高产”变“低产”，甚至酿成大祸。有些基层干部怕完不成“指标”，不好交差，就不顾安全，抱着侥幸心理蛮干。有一次“高产”，运输巷里的“煤溜子”负荷太重，不断跳闸，后来干脆就不能启动了，带班的副分队长着急上火，打开防爆开关，卸下防弧罩，用改锥去捅三相触点，要直接启动，顿时一个巨大的电弧火花从防爆开关里喷出，我的心不由得抖了一下。井下绝对禁止明火操作，一旦瓦斯浓度过大，后果不堪设想，这简直是犯罪！如此操作，我们离死亡仅一步之遥！还有一次“高产”，井上人员支援攉煤，分队长让我扫尾，我就一个人在后边清理。攉煤的人多，进度快，支柱工人少，支架跟不上，造成工作面顶板空隙大。忽然我觉得有东西掉在安全帽上，抬头一看，顶板在掉煤渣，用铁锹把浮煤捅下来，还继续掉，马上想到不好，分队长曾教过我，顶板落煤渣可能是冒顶的前兆，我就赶快向后退，躲进“落山”，一瞬间“轰隆隆”的巨响，空气像是在抖动，我刚才呆过的地方的顶板塌了下来，动力强大的钢铁运输机“煤溜子”被压得戛然而停住，冒顶了！我半天没缓过神来，一身冷汗，好险啊！

◇ 再教育、改造，还是专政

中国传统医学讲究“形”和“神”，而且更重视“神”的作用和影响，说明身体磨难和精神压力相比，后者的危害更大。我被发配到煤矿当了攉煤工，在井下饱尝了苦难和艰辛，已经是被“打翻在地”了。而受家庭出身所累，又被人“再踏上一只脚”，精神上承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巨大压力。这种心灵折磨比肉体伤害更难忍受，在回采二队的那两年，我是在压抑甚至惶恐中度过的。那时举目无亲，有苦也无处诉说，有着几乎身逢绝境的感觉。

一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1962级毕业生，在矿上政工组工作，悄悄告诉我，通知我去回采二队报到的那个干部科负责人，因我当时顶撞了他，告了我的黑状，为此军管会主任大发雷霆，话说得很难听。让我千万多加小心，别给抓住什么把柄。我的心情本来已经很沉重，从此又加上了一块大石头。

军管会主任姓任，白白瘦瘦，颇带几分儒雅，但是脾气特大，在矿上一手遮天，上上下下都怕他，俨然就是一言九鼎的“皇帝”。他是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可生产他是外行，只要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出来，马上就是“高产”庆祝。由于违反科学规律，经常是适得其反，“高产”变“低产”，这时就该气急败坏地追查事故，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了。干部职工敢怒不敢言，谁不怕当“阶级敌人”？1971年夏天，有一次，又要搞一个三天的“特大高产”，舆论造得轰轰烈烈，哪知天不作美，第一天就下起大雨，山洪暴发，把运煤铁路冲垮了，煤运不走，煤库满着，“高产”成了停产，工人们幸灾乐祸地说：“这回老天爷是阶级敌人！”军管会“促生产”是外行，“抓革命”可是够狠的，我初到矿上时，经常是大会小会批斗“牛鬼蛇神”，而且比北京还多出一招，山西话叫“用小绳勒”，五花大绑还不够，两个民兵把“牛鬼蛇神”提起来，再砸下去，借体重把人勒得紧绷绷的，而且还时不时地从台下揪出来新的“阶级敌人”，口号声震天动地，让人不由得脊梁冒冷汗，稍微有些“污点”的人，个个心惊肉跳。

俗话说“阎王好斗，小鬼难缠”，我的处境是“阎王”不好斗，“小鬼”更难缠！这个“小鬼”就是我在回采二队的书记，姓王，此人是“工代干”，“文革”初期在专案组

干过几天，后来混了个基层书记当。他不懂生产，卖嘴皮子是把好手，他基本上不下井，下井也从没见他干过活，“视察”一圈赶快就走，可下井费却是拿全月的。他整起人来轻车熟路，动辄就拿“阶级斗争”说事儿，无限上纲上线，工人们要是下班背块煤，背根木头，多报一两天下井费，他就说“挖社会主义墙角”。工人们瞧不上他，烦他，又都得防着他。队里有个支柱工，干活麻利，二十多岁就是六级，工人中威信挺高，都愿意跟他合作，就是出身不好，富农子弟。一次，天下连阴雨，他没及时领到雨衣，抱怨天气，在宿舍里百无聊赖，就在灶台上用粉笔瞎划拉，写了“可惜东风刮”几个字（在山西“可惜”二字是骂人的话）。这一下，大祸临头，被书记抓住，说他阶级本性不改，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伟大论断。于是，此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大会批，小会斗，这不就是清朝的“文字狱”吗？就在这么个“难缠小鬼”的“矮檐”下，我怎敢不低头！

可能是这位书记跟我“犯相”，也可能是他的“阶级立场”过于鲜明，两年的时间我们俩没说过几句话，他一见到我，脸就沉下来，原本就黑，看见我就更黑了，简直就是一种“威慑”。可我想不通：我的确出身不好，但本人并没有什么问题，按冠冕堂皇的说法，不是“重在表现”吗？而且，“上面”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这不是变成改造，甚至专政了吗？电影里农村大队书记对地主的脸也不过如此吧！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个“小鬼”书记的“脸色”，源自那个“阎王”军代表的“脸色”。看来，我无时无刻都要小心谨慎，稍有不慎，头上悬着的那把刀就会掉下来。政治学习时，让读报纸，我心里总是比较紧张，生怕把哪个“关键”的字或词念错，一字之差，“文字狱”落到我头上。

人们往往会对落难之人心怀恻隐，这个书记则不然，尤其是对我。有一次，我正在工作面“溜子”机尾清理残煤，突然“溜子搭桥”（20型“溜子”由于自身结构缺陷可能发生的一种事故，大链被溜槽中石块等坚硬物体卡住，如果防爆开关中保护系统负荷匹配不当，或者操作人员注意力不集中，电机传动系统不能及时停车，就会把溜槽拉得翘起），把顶板的支架撞塌，石头、木头往下掉，我被砸得头破血流，大家二话不说，一直把我从井下背到医院。好在骨头没伤着，把眉毛剃了，在前额缝了几针。工友们说：“这回坏事变好事了，能报工伤，不给你调到井上就别上班，老说头疼。”这在工人们中已经是惯例，我何尝不想这样，可就是没有那个“贼胆”，“阎王”“小鬼”都盯着我哪！医生给我开了半个月假（这是当时的极限，也是极少的待遇，防止工人“泡病号”），说下次再接着开，我也确实准备休息一段时间，恢复一下体力。谁能想到，第七天拆线，伤口还没消肿，队里记录员就来到宿舍，心不在焉地扯了一会儿闲话，吞吞吐吐地跟我说：“书记说这些天轮休的人多，攉煤工少，让你最好能上班。”可能他也觉得不合情理，显得很不自在。这书记还有人味吗？我强压住怒火答复记录员：“就这样吧。”第二天到接班室，看到我额头还裹着纱布就来了，工人们都很惊讶，上哪找这种傻子！围过来问这问那，可书记坐在那稳如泰山，看都没看我一眼，他要的就是这么股劲儿，难道这就是他“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吗？分队长说：“还是回去吧，井下风大，伤口容易受风。”我说：“可能没多大问题。”这真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分队长只好把人员调整了一下，说：“那你就开‘溜子’吧。”我见书记这时抬起了头，狠狠地斜了分队长一眼。

随着岁月的推移，我逐步能适应井下的劳动了，攉煤不但不拖大家的后腿，有时还能超过别人，还能帮助他们，渐渐地，我成了合格的“煤黑子”。有一天，“溜子”停了，大家钻进“落山”，一个工人说：“悠着点儿干吧，你干多好也没用。”接着就讲了说这话的缘由。原来，队里评先进，分队长把我报上了，大队长和别的分队长都同意，可是让第一把手书记给否决了。他说评先进得突出政治，说我和普通工人不一样，是来改造的，就应该干得好，不好好干就得“吃头子”。那时我早已万念俱灰，对什么先进不先进，从来就没想过。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个书记眼里，我到底是什么人？是所谓“接受再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地富反坏右？在他看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不够解气，还得让我“永

世不得翻身”。在北大时，曾听说过有什么“内定反革命”，难道在柳湾煤矿我被他们弄成“内定反革命”了吗？

◇ 峰回路转

1972年3月底，我在回采二队呆了整整两年，干部科把我叫去谈话，说根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经研究决定把我调到矿职工子弟学校教书。当时没有人重视教育，学校无非就是个哄孩子的场所，我不愿干，就婉言谢绝了。其后，干部科又找了我几次，那时干部科已经换了人，科长是个东北老头，到了山西东北人和北京人就算老乡了，互相之间也敢说点实在话。最后一次，他跟我说：“这可是从井下上来的机会，谁知道哪天政策又变了，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难道你就准备在井下呆一辈子？”这最后一句话说到我的痛处，而且转念一想，除此之外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好工作给我这样的人，就答应下来。

我被分在中学部，教八年级（相当于高一）的“工业基础知识”（物理和化学的合称），先讲物理。起初，我打心里就没想干，态度消极，有点“吊儿郎当”。可是，大概这些孩子们听说我是北大来的，有点盲目迷信，你怎么讲他们都爱听，能学进去，很认真。而且，虽然是处在那么一个年代，学校领导是个明白人，相当重视教育，学校的氛围和社会上大不相同。我被感化了，从此尽职尽责。那一年，全矿务局八个职工子弟学校搞了一次八年级物理统一考试，我这个班学生平均成绩超过八十分，绝对冠军。第二年，由于人员调整，我改教这个班的化学，化学教学很需要实验配合，可学校没有任何条件。当时虽说矿上不重视教育，可经费拨得挺充足，我就到太原联系购买仪器、药品，没用多长时间，就开了演示实验，学生自己也能做几个简单的实验。有一次，学生做“银镜反应”，当这些在山区长大的孩子拿到自己镀上银镜的试管，就不肯撒手了，死乞白赖地跟我商量：“让我们拿回家，作个纪念吧。”我还能说什么？

1974年3月，有一天主管机电的副矿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否愿意调到机电科，我说当然愿意，他就和我说了事情的始末缘由。原来山西省煤管局要在山西矿业学院举办“可控硅无级变速电机车”培训班，以促进在煤炭企业推广电子技术，柳湾煤矿分到一个名额。这位副矿长喜欢接受新生事物，但机电科的技术人员都是学强电的，对弱电不太熟悉，没有合适人选。他知道我是北大的，而且那时我经常给人们修理收音机（这点本事是“文革”中学会的，那时同学们都装收音机，我的水平属于平常稀松），大家把我宣传得挺神的，这位副矿长就看中了我。起初学校不肯放人，后来矿上就以一切服从生产为名，强行下了调令。临走时，我觉得挺对不住校长的，校长倒是很大度，说：“不能把你的前途耽误在这儿。”

从太原学习回来，我就在机电科工作。科里有许多燃化部情报所汇编的《燃化科技资料》，无人问津，我闲着没事就经常翻一翻，上面有不少国内外有关电子技术在煤炭生产领域应用的资料，颇能受些启发，我搞成了“可控硅无触点防爆开关”等几个技术革新项目。

离开回采二队后的几年，我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如果说我这个当年的“煤黑子”还多少有点用，那也是得益于北大。

◇ 知足

全国人民终于盼来了“四人帮”的垮台，那时百废待兴。1978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举办二年制“回炉班”（进修班）的通知，我真是喜出望外，回北京的机会来啦！但难题也来了，7月份考试，我连一本书也没有，书早就卖了废品。当时新华社

店还没有教科书。《高等数学》还好办，矿上有不少山西矿业学院的大学生，好歹找了一本；《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是借出差回北京的机会，到北大找老师借的。可是拿到书，我已经和里面的内容互不相识，十几年了，几乎一点儿印象都没有，那也得硬着头皮念，逐渐才开始恢复记忆。那时我正领着几个工人在安装、调试安全火花信号系统，任务催得很紧，白天晚上、井上井下地忙，只能挤时间念书，相当辛苦。7月中旬到太原参加考试，应该说题不难，记得高等数学有两道题几乎就是书上的例题——北大的老师们用心良苦，他们理解我们，同情我们，了解我们荒废了这么多年，北大惦记着我们！

拿到“回炉班”的录取通知书，我欣喜若狂，比1964年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要高兴得多。由于我平时表现不错，矿领导再三挽留，我说老母亲已年近七旬，一个人在北京无人照顾，那时人们的良知已经复苏，没有人会反驳这样的理由。1978年10月，我登上了去陕西汉中的火车，那时技术物理系还在653分校，一学期后迁回到北京。

在“回炉班”，大家学习都很刻苦，因为都很珍惜这在几年前绝对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机会。很有意思的是上大课，三类学生坐在同一个教室，一是恢复招生制度后的新大学生，他们是国家新的希望；二是我们这批“回炉”生，我们有着又回到家的感觉；再就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似乎有些受冷落的感觉。尽管当年“四人帮”要求“新老不见面”，但八九年后毕竟还是演出了“新老见面”，在这个教室中，让人看到了历史，看到了时代的变革，场面其实挺尴尬，历史颇具戏剧性，而现实又颇具讽刺性。

1980年7月“回炉班”结业，我到北京轻工业学院化工系教书。从此，工作变了，生活变了，心境也变了，与当年攉煤工的日子相比，犹如梦中。

□ 原载《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

#### 【研究报告】

文革后中国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遗产”  
——在庆应大学《毛泽东主义：半个世纪以后的视角》的研讨会上的发言

• 杨继绳 •

#### ◇ 毛泽东的遗产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在他逝世27天以后，他的夫人江青和其他三位文革领导骨干被捕。持续十年的文革随之结束。

文革结束以后，毛泽东留下了的遗产很丰富，他主要的遗产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强大的、高度集中的政权。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秦始皇和汉武帝。他的遗产中有两大问题，一是贫穷；二是专制。这两大问题都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在短时期内很难解决这两个问题。然而，三十多年后，中国的变化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中国是怎样从文革困境中走出来的？毛留下的问题是不是真正解决了？今天我就这个问题试作探讨。

#### 一，毛泽东的经济遗产

1949年以后，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在和平环境下，基数很低的国民经济，自然有一个快速的增长〔1〕。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这个比重下降到2.5%。1976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34.4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0.7%。

〔2〕

物资极度匮乏。粮、布、糖、肉、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各种票证成了比人民币更为重要的“特种货币”。

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3〕从农民身上积累工业建设的资金，从而把农村推向贫困。农业集体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56年为31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直到1978年才达到32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民基本上没有吃饱过。

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成了光秃秃的“和尚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平均年收入仅有76元（按当年汇价1美元1.72元人民币计算，合44.2美元，平均每天0.12美元〔4〕），其中两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低于50元。1978年，中国农民中，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5〕1978年，生活水平不如1950年代前期（即农业集体化以前）的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二，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1936年。〔6〕

在毛泽东时代，城乡差别很大。那么，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1975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按当年汇率1.97计算，为21美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居民家庭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破旧平房里的情况十分普遍。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

工人工作环境很恶劣。1972年9月14日天津劳动卫生防治院向我提供了一个调查材料证明，工人劳动保护很差，职业病很普遍，不少工人因工中毒。天津化工厂电解车间85人中有76人汞吸收，占总人数的79%。

几十年来，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辛勤劳动、节衣缩食，为什么还这么穷呢？

这是因为：消灭了私有经济，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政权直接组织经济活动。

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活动，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中枢支配，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

计划经济体制在技术上缺乏可行性〔7〕。在资源配置上用人们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计划决策失误不断地造成巨额浪费。更重要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懒惰之风盛行。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创新精神被压抑。经济机体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

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为了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就要清除“噪音”和“杂音”，实行舆论一律。

## 二，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在王权专制时代，由于交通、通讯、武器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皇权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还有荒蛮之地，化外之民。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靠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党内不同意见很难表达，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和监督力量很微弱。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的车间、班组和广大农村的田头、地角，深入到所有的机关、学校和一切单位。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而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书记当家，委员们对书记如众星拱月。行政领导人对书记俯首听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由于对各级领导人缺乏监督，特权就不断发展。官僚特权造就了严重的官民矛盾。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是想解决官僚特权问题。然而，他不是建立权力制衡制度来阻止特权，而是用没有制衡的最高权力来制止官僚的特权，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以后官僚特权进一步发展。

政治遗产的灵魂是理论遗产。毛泽东的理论遗产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特别是在经济上已经消灭了阶级以后，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开展阶级斗争，甚至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的理论遗产构成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多年来，为了将意识形态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施行严密的舆论控制。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最高权力中心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集中智慧，全力论证党政策、路线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极尽才华，歌颂党和领袖；一切新闻机构，都夜以继日地发布证实党英明、正确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任务。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

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力。通过组织手段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人们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党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了全国人的思想“一体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 ◇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光谱

文革结束后，人们期待改变极度贫困和极端严酷的政治，期待一场大的变革。

然而，变革的方向和深度，要由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来决定。文革结束以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左右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力量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体制。

粉碎“四人帮”，使得这股力量大为削弱。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多年意识形态的灌输，毛晚年的路线在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基础。

第二种力量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在政治上松动一些，经济上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

第三种力量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文革结束之后，还没有人敢说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是这种力量的代表。

第四种力量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一种主张彻底的改革的力量。这就是自由民主派。文革刚结束时，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主流社会，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只是在民间和少数知识分子有这种主张。

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和坚持毛晚年路线的人们，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和陈云代表的第二种力量。中国的前途不是由每一种力量单独决定的，是由四种力量角逐中形成的合力来决定。

前三种力量，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分歧，但在政治上都是坚持毛留下的制度，即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只有第四种力量主张建立民主制度。在第四种力量比较弱的时候，前三种力量围绕经济改革的目标相互斗争。一旦第四种政治力量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时，前三种政治力量就联合起来共同打压。

#### ◇ 如何摆脱历史惯性

如何处理毛泽东的遗产，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继毛泽东之后，作为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对解决这个难题没有大的建树。1976年10月26日，他对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谈揭批“四人帮”时说：“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1977年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显然体现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意图。华国锋还发表文章，提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8）。

尽管华国锋下台时加在他头上的几条“罪状”十分牵强，尽管在他主政的两年多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在酝酿，但是，“两个凡是”的负作用还是不能否认的。

“两个凡是”的提出无疑有历史惯性的作用。多年灌输的意识形态为毛的体制作出了合法性的注释。多年靠这种意识形态维持权力的官员，不少人支持毛的体制。大批对这种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政治愚民，也是毛体制的盲目支持者。对毛泽东的迷信已经深入到很多人的细胞和血液之中，谁敢说毛主席的话不是真理？谁敢对“最高指示”有半点迟疑？当时，挑战毛泽东的体制就会危及身家性命。华国锋虽然有抓捕毛夫人江青的勇气，却没有摆脱历史惯性力量。

在“两个凡是”的约束下，华国锋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华国锋要求各地建设“大寨县”，坚持农业集体化，反对农村包产到户。

揭、批“四人帮”还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细分析一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掌握权力以后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当时需要揭批的是“四人帮”的政治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政治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这一政治路线，还要高举这一旗帜。于是，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现象：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自己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这种批判在政治和理论上形成了无比尴尬的局面。

当时的报刊的宣传逻辑混乱，牵强附会。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9）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

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10）。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于1976年12月9日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关押了几年，1977年12月4日被枪毙。华国锋主政期间，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四五十人。这些被杀的人，多数是思想解放的先锋。

“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下来了。华国锋作茧自缚，他很难有所作为；“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进。

当时很多人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和撤销邓小平职务都是毛泽东钦定的。要坚持“两个凡是”，这两个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必须向“两个凡是”挑战。在高层，邓小平是向“两个凡是”挑战的代表人物。

当时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邓小平用政治智慧规避了风险。他用抬高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来降低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11）。他在“必须世代地”这个豪华的包装中，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漂亮的却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他解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完整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12）

然而，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超级权威作为最高裁决。这新的超级权威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送走了一个毛泽东，又再造一个“毛泽东”。这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就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几十年来，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这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用社会实践标准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个标准。这场大讨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引发的。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是孙长江、胡福明，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在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了关键作用。

社会实践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短期找到结论，它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够明辨是非。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包含着一个重要任务——真实地还原百年来的历史过程，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就要颠覆几十年来官方按照意识形态的需要编定的历史教科书。执政者不允许这样做。这为进一步解放思想设置了障碍。

不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破除了对毛泽东迷信。这个“现代迷信”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二十多年。现在终于要砸碎精神枷锁！

#### ◇ 一股汹涌的民主浪潮

枷锁一旦松动，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猛烈冲击着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其标志就是“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西单墙是民间的，理论务虚会是官方的。什么是惯性？牛顿惯性定律：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物体会一直保持原来的运动或静止状态。对毛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来说，民主浪潮就是扭转历史惯性的外力。

“西单墙”，是从北京电报大楼到西单路口的两三百米的一段临街墙。毛泽东时代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文革结束后，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从1978年春天开始，长安街北侧的这段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求救文字的园地，后来很多人贴出小字报、大字报，发表自己的政治诉求。小字报、大字报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每天都是新的覆盖旧的。看大字报的人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有的听，有的记录。通宵达旦，人流不息。这段墙就被人称为“民主墙”。北京的“民主墙”的影响到全国，其它一些大城市也有类似的“民主墙”。

“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以外，还有泛泛地倾诉冤案无处申诉的怨忿。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三是对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报控诉中国没有民主，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贵州的《启蒙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贴的大字报用寓言诗的形式，暗示毛泽东是封建专制。黄翔的《火神交响诗》，提出“把暴力和极权交给死亡”，“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捣乱和拆毁”。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

“西单墙”继续发展。出现了各种民间报刊。又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民间政治组织有“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天津“觉悟社”，等等。

“西单墙”继续发展，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越来越大。在讨论会上演讲者措辞激烈，富有煽动性。

与民间民主浪潮相呼应，在理论工作者中间也发出了强烈的民主呼声。这就是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

理论务虚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中间春节休息了5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第二阶段计划从3月开到4月。

1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号召大家，“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



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13〕邓小平也指示这个会“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讨论者的发言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一些理论工作者发言尖锐，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检讨，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力量的冲击波，“西单墙”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受旧体制之害最深的底层群众的冲击波。二者合流，构成了中国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浪潮。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1978年11月26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14〕叶剑英12月13日的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12月初，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之后，对法国记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话。在同“凡是派”作斗争中，邓小平还要借助民间的力量，还要借用党内外的民主浪潮。

然而，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 ◇ “苏学为体” “西学为用”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对毛时代的激烈批判，“西单墙”引发的群众请愿，上海下乡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使高层感到，这些将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高层一些人对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很不满意。邓力群说：“会开的时间愈长，发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15〕邓小平感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担心局势失去控制，他也受到了来自党内多方面的压力。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2月22日结束。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作报告，听众不仅仅是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几百人，在首都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满了整个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人感到，这是向全党、全国的一次反右的政治动员大会。他的话音刚落，理论务虚会就草草收场。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中说：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都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16）

邓小平当时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稳定社会，为了稳固政权，如果国家出现乱局，不仅不可能改革开放，局面也难以收拾。“四项基本原则”最关键的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一切资源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唯一能控制局面的力量，中国的问题还得由共产党来解决，即由共产党领导的改革来解决。这是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也是当时中央高层的共识。然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以理解为坚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如果真的全盘继承毛泽东体制和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改革开放了。为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诠释。共产党的教科书上将社会主义定为几个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邓小平不提这些，却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

为了维持稳定，三四月间，北京抓了几个人，刹住了“西单墙”引起的民主浪潮。各地也逮捕了一些人。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自12月8日起，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大字报。与“民主墙”同时出现的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也消失了。1980年2月23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同年8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从此，在中国盛行了近30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

既然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就必须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明快、干脆地回答：“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以后，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重要文件，为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作一个结论。这个文件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从1979年11月开始，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起草这个文件。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过10次谈话。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初稿形成后交给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又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7次修改才定稿。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高级干部的讨论过程，是达成妥协、取得共识的过程。

《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两个阶段：晚年的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时期。晚年的毛泽东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光辉的。《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

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说《决议》是一部历史决议，不如说它是一部政治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党内高层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历史活剧。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遗产，在经济体制上，推行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7年，赵紫阳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坚持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发展经济的经验。这类似清朝末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思想。〔18〕“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晚清的政治体制，“西学为用”，就是引进和利用西方的器物层面的经验，强化晚清的政治体制，巩固晚清的政权。在邓小平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学为体”，改革开放就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制度。由于这个制度来自苏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就是引进和利用西方的经验，发展经济，以此来巩固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改革开放，使得多年被压制的社会活力一下子迸发出来，再加上吸收西方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使经济持续三十多年快速增长，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的趋势。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举世公认的成绩。这是将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造就的奇迹，这是多年禁锢的劳动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后，必然出现的奇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摆脱多年极度贫困的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各种政治力量都有共识。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旦作为最高的共识，就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取代，就出现了社会宽松的效果：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政治贱民及其家属上亿人取得了政治平等的地位，这是一次了不起的人道主义壮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对外开放。这就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的自由带动了政治体制有所改善：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最高领导集团中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地方政府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虽然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但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有巨大进步。但是，毛泽东遗留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繁荣背后还隐藏着危机。

#### ◇ 权力市场经济

毛泽东提出“当权派”这一概念，就包含着官民对立的意思。对中国来说，这有着强烈的针对性。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僚们，控制着全国的一切资源，普通民众只能接受官僚的支配。这种体制很容易产生官僚特权。毛泽东动员群众揭露和批判官僚制的弊端，企图通过“继续革命”来克服。然而，毛泽东不可能承认，官僚特权的形成，是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的结果，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文革不仅不能触动“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制度，反而还要强化这个制度，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

中国的官僚体系是一种纵向命令、层层授权的等级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将这种制度称为科层制，也叫官僚制。中国社会学家孙越生指出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19〕。作为公共国家，官僚体系承担着管理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只有从制度上、法律上不断完善、加强对权力的制衡，才能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才能克服官僚制的弊端。文革初期，毛泽东号召群众按巴黎公社原则“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砸烂以后靠谁来管理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最后还得把官僚们请回来。所以，文革最后胜利者必然是官僚集团。

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是重建官僚体系的过程，是中国的官僚制度迅速发展和急剧膨胀的过程，形成了1949年以来最庞大、最强壮、最细密的官僚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全面强化了官僚制度。官员队伍的膨胀就是一个明显的指标。官员队伍的膨胀从1970年重建政权机构时就开始了，到改革开放时期更加严重。

官员过多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太大的压力，又使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多少年来，当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精简机构，压缩人员。但是，官员人数还是越来越多，形成了膨胀一压缩一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就业人数〔20〕（年底数）单位：万人

=====

| 年代   | 人数    |
|------|-------|
| 1965 | 287   |
| 1975 | 357.6 |
| 1979 | 451   |
| 1980 | 477.1 |
| 1981 | 506.7 |
| 1985 | 799   |
| 1986 | 872   |
| 1987 | 925   |
| 1988 | 971   |
| 1989 | 1022  |
| 1995 | 1248  |

文革初期，党政机关受到冲击，上述财政供养的非事业单位的人数降到240万以下。恢复秩序以后，官员人数迅速膨胀，1975年达357.6万人。以后经过多次精简和多次扩张。1996年为了精简政府机构，将一些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单位划为事业单位（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事业单位的费用不在“国家行政管理费用”中开支，因此公务员人数有所减少。但是，1996年公务员还有1096万人。〔21〕

在公务员数量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1996年以后的数据我没有拿到，从国家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的膨胀也大体可以看到官僚体制的膨胀状况：

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22〕单位：亿元

=====

| 年代   | 数量   |
|------|------|
| 1978 | 49.1 |

|      |        |
|------|--------|
| 1985 | 143.6  |
| 1990 | 303.1  |
| 1993 | 535.8  |
| 1994 | 729.4  |
| 1995 | 872.7  |
| 1996 | 1040.8 |
| 2000 | 1787.6 |
| 2005 | 2883.5 |
| 2006 | 3355.8 |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2006年的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是1978年的68.35倍！从2007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的没有“国家行政管理费用”这一项，而有“一般公共服务”，这应当是和“国家行政管理费用”相当的，即官僚制度的行政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数据是：2007年8514.2亿元；2008年9795.9亿元；2009年9164.2亿元；2010年9337.2亿元，2011年10987.8亿元；2012年为12890.8亿元；2014年为13876.2亿元。（23）7年增长了63%。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造成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在官僚队伍膨胀的同时，警察队伍也大加膨胀。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时，说“警力不够”，就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后来就加快扩充警察队伍。1992年扩充到130万人。到新世纪，扩充到数百万人。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摘要》中，有几个年度在“各地财政支出分项数”中公布了“武装警察部队支出”，现摘其数字列表如下：

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地方合计），单位：万元

=====

| 年代   | 数量      |
|------|---------|
| 1997 | 56,111  |
| 1998 | 104,632 |
| 2002 | 208,522 |
| 2003 | 242,441 |
| 2004 | 309,307 |
| 2005 | 410,708 |
| 2006 | 626,459 |

资料来源：从历年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中摘取。

上表中的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地方合计）不包括中央一级武装警察的支出。从上表中可看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增速度之快。在2006年以后，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这个数字。2006以后更加强调维稳，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费用，这个数据一定增长更快。

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互动：改革开放为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扭曲了改革进程。

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改革结果，就造成了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所谓权力市场经济，即国家行政权力主导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而这种权力，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没有经过大的改革的权力体系，是不受制衡的权力体系。有人将权力市场经济称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政府的管理范围和政府行为又不受宪法的约束。政府主导实际是官僚集团主导。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官僚集团用行政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规则被官僚集团的意志严重扭曲。

权力市场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失去社会公正。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为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扭转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局面，几千万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农民失去了土地；两亿多农民在城市做工，却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经济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官僚权贵们占有了蛋糕最大、最有营养的部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一。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各方必须地位平等。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者和无权者进行交易，必定前者胜，后者败。这样，财富就向有权的人和与权力有关系的人集中。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权力，具有强大的吸金优势，一些权力中心成了填不满的吸金黑洞。因此，在大量没有权力背景的人当中，就产生了“仇官”和“仇富”情绪。

由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很容易被掌权者“私有化”（分割式私有）。被“私有化”了的权力控制市场、操纵交易、权力本身也进入了市场。权力操纵资本，资本收买权力。一旦权力进入了市场交易，由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就成了最稀缺的“商品”，是千万家企业不得不“购买”的“商品”，自然是最昂贵的“商品”。权力越大，控制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容易发财。

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能把一件事情办成功，不在于你有多少才能，而在于你是否和掌权的关键人物有关系。同掌权的人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卖官鬻爵的选官过程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是一张人事关系网。权力进入市场以后，同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上级和下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联结成了利益关系网。无论是干部任命中形成的人事网，还是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网，都是偏离社会正义的黑网。这样的“互联网”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保护腐败的同盟。

在权力不受制衡的同时，资本的贪婪也没有受到节制。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其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批判资本贪婪的著作汗牛充栋。马克思说过“资本的每个毛孔中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人们今天在利用资本的时候，却忘了资本贪婪的这一面。黑砖窑事件〔24〕、毒奶事件〔25〕等种种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们，资本的贪婪性是不会改变的。资本报酬挤压劳动报酬。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53.4%，2007年为39.74%。7年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和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相对应的是资本报酬所占的比重上升。〔26〕

资本的贪婪和权力的滥用恶性结合，是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超级富豪的队伍逐渐壮大。中国的超级富豪中很多是权力和资本幕后交媾的产物。

与富可敌国的权贵集团相对应的是庞大贫困群体。如果采用世界银行用每天人均消费低于1美元作为国际贫困标准算，中国贫困人口远远超过1亿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27）

中共中央一直反腐败，而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这是很得人心的。但是，只要权力市场经济这个制度存在，腐败分子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制度性腐败的土壤滋生了权贵阶层。由于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为权贵阶层造就了巨大的利益，还在继续造就利益，权贵阶层就力图保持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他们更加坚持“苏学为体”，千方百计地阻碍政治体制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描述这个制度。他这个说法有相当的现实性和尖锐性。但是，这一说法误读了资本主义，也回避了权力的责任。所以，我一直坚持用“权力市场经济”来描述这个制度。

#### ◇ 第五个现代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体系”和“制度”在英语中是一个词（system），这说明，中共中央要着手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制度，决不是沿袭两千年的专制制度，决不是已经被俄国和东欧废除的苏式制度，也决不是制造不平等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那是什么制度呢？只能是宪政民主制度，就是中国仁人志士渴望了百年的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中国早就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这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即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防止权力和资本成为统治民众的暴君，让权力和资本成为广大民众的福祉。如果真正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中国就要走出“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死胡同，就要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的陷阱，就会实现现代制度文明。

当然，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问题为导向，解决一个问题就前进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向目的地。问题导向，步步前进，必须是主动的，自觉的。如果没有自觉的、主动的和平渐进，矛盾不断积累，就可能发生突变。突变的前景是不可知的，是危险的。（完）

注释：

1，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78年和1949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由466亿元增长到5634亿元，增长了11倍；国民收入由358亿元增长到3010亿元增长了7.4倍；钢产量由15.8万吨增长到3178万吨，增长了200倍；粮食产量由11320万吨增长到30477万吨，增长了1.69倍。其它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也都是大幅度增长。

2，201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1.34%。

3，“剪刀差”，即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国家向农村销售的工业产品价格高于其价值。价值，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概念，即生产这种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4，当年中国进口（设备）多、出口少，为了有利于进口，人民币定价过高。以下同。

5，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3页。

6，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7页、第19页。

- 7,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7—29页、第295—297页,对计划经济不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 8, 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
- 9, 《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2日。
- 10, 《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3日。
- 11, 《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的信》,1977年4月10日。
- 12,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2页。
- 13, 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60页。
- 14, 《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年谱》第436—437页记载了这次谈话,但删除了这一句话。
- 15,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征求意见稿,2005年,第206—207页。
- 1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165—173页。
-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 18, 我在1998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两个基本点的碰撞”这一章的原稿中,写到“两个基本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被出版社删掉了。
- 19, 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2页。
- 20,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这里的“社会团体”是指是民主党派、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党和政府的附属,靠国家财政开支,不是NGO。
- 21, 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摘要》。
- 22, 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 23, 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摘要》,后一年代与前一年代公布的数字略有差别,因为后一年对前一年有所修正,凡有不一致的,本书选后一年代的数字。
- 24, 黑砖窑事件是指发生在2007年前后,一些砖窑窑厂非法拘禁并强迫农民工从事危重劳动、非法收买和使用被拐骗儿童、恶意拖欠工资,并豢养帮凶强制劳动每天长达14小时到16小时不给任何劳动报酬。
- 25, 三鹿奶粉事件,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在其奶粉中被发现三聚氰胺。截至2008年9月21日,接受门诊治疗咨询且已康复的婴幼儿39,965人,住院12,892人,死亡4人。
- 26, 宋晓梧,经济参考报网络版,。2011-02-09 07:35:00
- 27, 中国贫富差距的具体情况,见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第59—84页。

□ 摘自作者个人网站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